



夏夷商

徐昭峰 著

三种文化关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资助

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

徐昭峰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对夏商时期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夷商三族及其所对应的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布、类型进行了创新性探讨,同时从这三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联合、竞争、对峙及战争等关系的角度全面考察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 / 徐昭峰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3-037375-5

I. ①夏… II. ①徐… III. ①黄河流域—民族文化—文化关系(考古)—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国—夏代②黄河流域—民族文化—文化关系(考古)—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国—商代 IV. ① K871.34 ②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5286 号

责任编辑: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1/4

字数: 380 000

定价: 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徐昭峰副教授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从事考古教学、科研及学科管理工作，他1997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由于学习期间品学兼优，毕业之后被推荐到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先后参加过著名的煤山遗址、妣与寨根遗址、盐东遗址等地的发掘，并清理过几个时代的墓葬，做了不少考古实际工作。在考古实习和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并有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作风，发表了多篇简报和论文。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后被借调到洛阳市文物局工作，期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攻读文物保护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2005年，为了进一步深造，他毅然决然辞职，又返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跟我攻读商周考古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读期间，他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先后在《文物》、《考古》等期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从而显示出他经过学习、实践、再学习，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考古知识和田野考古经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研究基础。

《夏夷商三种文化研究》是我为昭峰拟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一课题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不久提出的，它依然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前沿的学术热点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涉及面广，资料分散、繁杂，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又错综复杂，不易梳理和把握，研究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为了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提高驾驭纷繁复杂资料的技巧，他欣然决定攻克这一具有学术意义的课题。经过废寝忘食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按期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任务，并获得好评。

现在出版的《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是昭峰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进行加工撰写而成。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所见对夏夷商三种文化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成果。

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占有比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写成。从考古学上对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分期、类型、分布和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依三种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之分，并把对应关系作了界定。然后分夏代和商代两个时期，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进而结合文献上有关夏商的历史记载，进行综合研究，以窥视夏商历史中的史影，由此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书着重论述了与夏、夷、商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和商文化之间，存在有文化中心的互动关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文化中心的互动和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在夏代，在三种文化中，是以强势的二里头文化为中心展开互动。这种互动，与前国家时期那种自发的、松散的关系不同，是一种规定的统治秩序和朝贡体系的互动。到了商代，这三种文化以二里岗期文化为中心展开互动，这种互动既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

互动，亦有征伐战争的互动，这些互动客观上加速了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融合过程。

总之，昭峰君所著的《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是目前所见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独立思考的见解，闪现出学术创新的火花。当然，书中也存在有研究未及和薄弱之处。其中，对夏夷商三种文化分期及对应关系，仍有可探讨的空间，对晚商时期商夷之间的文化关系研究亦显薄弱，对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层解析等，这都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昭峰博士毕业后参加工作五年来，研究成果在《光明日报》、《文物》、《考古》等报刊上，都陆续见有发表，在考古业务上发展的势头比较强劲。本书的问世，是他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又一项阶段性成果，向他表示祝贺。希望他继续努力学习，再学习，尽早尽快了解和熟悉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教学和科研上互促相长，把研究推向深入，培养出更多的考古人才。借此预祝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成为东北考古的一支新生主力军。

陳旭

癸巳年三月十三日
于邵州大学寓所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一、夏夷商三种考古学文化的概念	(1)
二、本书研究所涵盖的时空框架	(2)
第二节 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发现与确认	(3)
一、二里头夏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3)
二、岳石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4)
三、商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5)
第三节 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前瞻	(6)
一、夏商文化关系研究现状	(6)
二、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现状	(7)
第四节 研究的意义与理论方法	(9)
一、研究意义	(9)
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1)
第二章 夏夷商三种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13)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13)
一、二里头文化的特征	(13)
二、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15)
三、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与分布	(21)
第二节 岳石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30)
一、岳石文化的特征	(30)
二、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33)
三、岳石文化的类型及其分布	(41)
第三节 商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49)
一、先商文化	(51)
二、早商文化	(65)
三、中商文化	(71)
四、晚商文化	(76)
五、商代纪年	(81)
第四节 夏商分界及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	(81)

一、早夏文化·····	(81)
二、夏商分界·····	(84)
三、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	(90)
第三章 夏代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 ·····	(92)
第一节 夏代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关系研究·····	(92)
一、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岳石文化的关系·····	(92)
二、二里头文化中晚期与岳石文化的关系·····	(99)
三、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关系及其作用·····	(107)
第二节 夏代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研究·····	(109)
一、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先商文化的关系·····	(109)
二、二里头文化晚期与先商文化的关系·····	(112)
三、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关系及其作用·····	(125)
第三节 夏代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关系研究·····	(127)
一、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关系发生的背景·····	(127)
二、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的交流·····	(128)
三、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关系及其作用·····	(134)
第四节 夏代夏夷商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139)
一、以夏文化为核心的夏夷商三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39)
二、夏夷商三族的对峙与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144)
三、先商文化的发展及其作用·····	(148)
四、商汤伐夏的路线问题·····	(155)
第四章 商代商夷文化关系研究·····	(156)
第一节 商初商夏文化关系研究·····	(156)
一、早商王朝为巩固统治对夏遗民采取的措施·····	(156)
二、早商文化对二里头夏文化的吸收和发展·····	(159)
第二节 早商时期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关系研究·····	(169)
一、早商时期商夷联盟关系的考证·····	(169)
二、早商时期商文化与岳石文化的交流·····	(171)
第三节 中商时期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关系研究·····	(176)
一、中商文化的论定·····	(176)
二、中商文化早期商文化的东渐·····	(179)
三、中商文化中晚期商文化的东渐·····	(183)
四、中商文化时期的商夷文化融合·····	(186)
五、岳石文化消亡的时间·····	(188)
第四节 晚商时期商夷文化关系研究·····	(189)
一、甲骨、金文所见商王朝与东夷诸族的关系·····	(189)

二、出土青铜铭文资料所见商王朝的东土方国或族群·····	(195)
三、考古学文化反映出的商王朝与其东土方国的关系·····	(199)
四、晚商时期的东夷文化——珍珠门文化·····	(203)
第五节 商代商夷文化的关系对周初实现对东方统治的作用·····	(207)
一、商代商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周初实现对东方地区统治的影响·····	(207)
二、周初对原商东土的经略·····	(210)
第五章 夏夷商三种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11)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11)
一、二里头文化对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	(211)
二、二里头文化对西部地区文化的影响·····	(212)
三、二里头文化对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	(213)
第二节 岳石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16)
一、岳石文化对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	(216)
二、岳石文化对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	(217)
第三节 商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20)
一、先商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20)
二、商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220)
第六章 结语·····	(226)
附表 有关夏夷商三种文化年代的测年数据·····	(230)
参考书目·····	(239)
后记·····	(247)
Abstract·····	(249)

第一章 绪 论

夏商考古无疑是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关注的热点，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夏商考古对探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发展都具有典型意义和借鉴意义。在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分属华夏、东夷两大集团的夏夷商三族所对应的三种文化，各有不同的分布地域，三种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角力，包括这三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联合、竞争、对峙及战争等，对推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及地域的扩展、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统治方式的探索性的、渐进式的确定等，无疑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三支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包括彼此之间的地域分布、相互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一种互动式的、决定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态势的一种关系。

对夏商史的探讨，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单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去系统研究夏商历史仍不失一个另辟蹊径的研究思路。对夏夷商三种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可以说学术界涉及得也比较多。多集中在夏代初期、夏末商初及中商、晚商这些时空范围内。探讨的内容多集中于三种文化中的某两种文化相互之间文化因素的分析及对几件具体事件的联系，如夏代早期太康失国及与其有关的夷羿代夏、浞因羿室事件，夏末商汤联夷灭夏事件，中商时期仲丁征蓝夷及其相关问题，晚商帝辛征东夷的路线及涉及的方国地望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书将以田野考古资料为主，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等，全面、系统地对夏夷商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解读出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期望对探索及重建夏商历史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涵盖夏夷商三种考古学文化，包括三种文化的内涵、关系等方面，而探讨这一问题必然要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

一、夏夷商三种考古学文化的概念

什么是夏文化？虽然学者间还存在不同的理解、认识，但总的来说，学术界的认识已比较趋同。夏鼐先生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的祖先的文化，那也只能算是‘先

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古、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①。这一定义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认识，认为夏、商同民族、同文化，它们之间只发生过政权更迭关系，并无所谓文化更迭或突变的情况^②。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夏族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和灭亡之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欲对夏文化的定义进行补充，分别名之曰“先夏文化”和“夏遗民文化”^③。但考古学界对夏鼐先生的结论是赞同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那种将夏商文化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确切的。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不等同于夏代文化。

商文化的概念应与夏文化的概念表述略同。同时，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先商文化和商遗民文化的存在。

而本书主要讨论的夷文化，实质即是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具体到考古学文化即是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以及晚商时期的珍珠门文化。

二、本书研究所涵盖的时空框架

界定于夏商时期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关系研究，其时空框架上起于夏代建国之初，下迄于商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大的框架。故此，夏王朝建立以前的所谓先夏文化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同时，商王朝灭亡之后西周初年的商遗民文化也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

本书所要讨论的夏文化即考古学文化上所对应的二里头文化，涵盖其几个类型。如前所述，先夏文化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而在考古学上什么是夏遗民文化尚存在争议，故本书也将予以探讨。

本书所要讨论的商文化则包括先商文化及商王朝统治时期内的商代早、中、晚各时期的商文化。因先商文化已处在夏纪年的范围内，且先商文化与夏文化及东方的岳石文化之间的对峙、交流与融合等关系，特别是夏代末年的夷商联合西向灭夏并最终建立商王朝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故有必要将先商文化纳入到本书所讨论的范围内。而商王朝统治时期商代早、中、晚各时期的文化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则包括以二里岗等遗存为代表的早商阶段，小双桥、洹北商城等遗存为代表的中商阶段和以殷墟等遗存为代表的晚商阶段。

本书所要讨论的夷文化即如前所述的岳石文化。该区域此前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虽然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及

①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②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和年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田昌五先生也有类似认识，见《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第380～388页。

③ 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夏王朝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岳石文化的归属问题,也即晚商时期所谓的珍珠门文化^①,本书也将做一简单探讨。

第二节 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发现与确认

一、二里头夏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夏王朝,这个问题在近代疑古学派提出质疑之前多不怀疑。因为史书中有关夏的记载还是不少的。但单从史书记载来讨论夏代的历史,被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连起码的夏代的一件遗物也不能确指。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的可靠性,亦坚定了学者们探讨夏代历史的信心。众多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刚刚起步的考古学,期望中国的考古学可以揭开夏代的文化及其历史,最好能像殷墟的甲骨卜辞一样,发现大量的夏代文字。

虽然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但学者们还是对发现的早于殷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性质进行了探讨,曾先后提出仰韶文化^②或者龙山文化^③是夏文化的观点。

但对夏文化的探索取得突破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在郑州发现的二里岗文化^④,大大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而现在已经确认的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首先发现于河南登封的玉村,当时的调查者提出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两个文化系统的认识^⑤。其后,在郑州洛达庙也发现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的遗址^⑥,学者们开始将探索夏文化的注意力集中于该类遗存,提出介于郑州商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之间的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最可能是夏代的^⑦,或认为“洛达庙层”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对象或线索^⑧。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夏墟”的调查中,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⑨。随着二里头遗址发掘规模的逐步扩大,发现它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二里头文化的面貌也日见清晰。基于此,夏鼐先生将其称之为二里头类型文化^⑩,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改称其为二里头文化^⑪,这

① 严文明:《东夷文化初探》,《文物》1989年第9期;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②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第48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知书店,1947年,第13页。

④ 赵全赓:《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6期;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郑州二里岗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八册。

⑤ 韩维周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⑥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⑦ 李学勤:《近代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⑧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⑨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⑩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

⑪ 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一称谓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从考古学上确认夏文化，其一要限定夏代纪年的范围，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基本将夏代的纪年限定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其二是考察夏人的活动地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人的活动地域集中于豫西和晋南地区；其三要找出与此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来看，二里头文化处于史前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正合于文献记载的夏纪年时空范围内，且其分布地域也恰好与夏人的活动地域一致；其四二里头文化有一组不同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组合，其一至四期有一脉相承的承袭关系，它上承王湾三期龙山文化，下启二里岗早商文化，属于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五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及大型礼仪夯土建筑与青铜、玉礼器的发现^①，研究者多认为二里头文化已进入真正的国家阶段。综上，二里头文化与开创中国青铜文明先河的夏王朝是极其吻合的。现在虽然对二里头文化的头和尾还存在争议，对早夏文化和晚夏文化有不同看法，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二、岳石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岳石文化是介于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豫东、苏北、皖北等地。《说文·大部》：“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岳石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所载东方夷人所居之地相合。

岳石文化的发现可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但对它的认识则始于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发掘的平度东岳石遗址，发掘者意识到了它与城子崖龙山遗存文化面貌的区别与联系^②。197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一次发掘泗水尹家城遗址，又发现了此类文化遗存，即简报所称的“尹家城第二期文化”，它介于龙山文化层与商文化层之间^③。这是第一次从层位关系上将后来确认的岳石文化遗存同龙山文化区分开来。此后，与岳石文化一类遗存有关的考古资料日趋增多，对它的研究与认识也日趋深入。

20世纪70年代末，有学者指出岳石一类遗存“可能仍在典型龙山文化中另立一期，或独立为晚于龙山文化的另一文化”的见解^④。20世纪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在论及山东龙山文化的去向问题时指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鲁中南不甚清楚，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并推测其族属应是夏

① 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8～65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第一次试掘》，《考古》1980年第1期。

④ 黎家芳、高广仁：《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文物》1979年第11期。

代前后的夷人^①。此后关于岳石文化的考古资料日趋丰富,如对泗水尹家城的持续发掘^②,青州郝家庄^③、牟平照格庄^④、安邱(现安丘,下同)堽堆^⑤、河南鹿邑栾台^⑥、杞县鹿台岗^⑦等遗址的发掘。随着资料的积累,学界对岳石文化的探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涉及其区域类型、族属、社会发展阶段及相邻同时期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而岳石文化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慢慢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三、商文化的发现及确认

商文化的发现可上溯至19世纪末安阳甲骨文的发现。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将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同文献相勘对,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⑧,第一次从文献材料之外的地下古代遗物中契刻的文字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商王朝的存在,其影响及意义可谓深远。

在随后的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对安阳殷墟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发掘,重要收获之一是确定了安阳殷墟作为商代后期王都的地位;二是发现了后冈三叠层。基本搞清了殷墟的布局,建立起了殷墟晚商文化的基本分期。结合与陶器伴出的甲骨卜辞和有铭铜器,证明殷墟为晚商都城,其主体文化始于武丁、止于帝辛,并将殷墟的四期文化分别与武丁至帝辛商王相对应^⑨。

商代后期文化遗存安阳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使寻找商代早期文化的课题自然而然产生了。20世纪50年代初,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遗址,从发现之初便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邹衡先生率先对郑州新发现的商文化遗址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将其与小屯殷商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指出郑州发现的殷商文化与小屯殷商文化是同一文化系统并早于小屯,初步建立起了商文化的发展序列^⑩。在《试论夏文化》^⑪一文中,邹衡先生建立

①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7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吴玉喜:《益都县郝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5年;《岳石文化地方类型初探——从郝家庄岳石遗存的发现谈起》,《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⑤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菏泽安邱堽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⑦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⑧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9~286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⑩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⑪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起了较完整的商文化发展序列，其中包括先商文化。

近年来新发现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商代城址如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洹北商城等，以及围绕上述诸城址包括郑州商城等性质的探讨，推动了商代考古的发展，为进一步复原商代历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虽然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学术界对夏商考古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有了更为趋同的认识。

第三节 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前瞻

关于夏夷商三种文化的关系研究，在岳石文化尚未确立之前，学术界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夏商两种文化的关系上。

一、夏商文化关系研究现状

由于受传统史学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夏商文化局囿于同源、同族、同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夏文化与商文化只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无性质上的区别。即使现今仍有一些学者坚持此种见解^①。也有学者认为夏商文化虽然族属不同，但在文化上则大同小异，二者主要表现在时代上的区别^②。考古发现则证明夏商文化的确存在很大差别，不仅族属不同，文化性质也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由于夏文化与先商文化长期并存，并且夏王朝与先商时期的商族应该还具有比较松散的同盟或者说某种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所以说夏商文化之间的交流、相互影响、可能还有战争促使两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承袭是客观存在的。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③考古发掘显示夏文化中有先商文化因素，而商文化包括先商文化中同样有夏文化因素。而且早商文化对夏文化包括夏礼的继承也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有关夏商分界包括夏商文化分界问题也不会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

目前有关夏商文化的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是夏商文化虽互有影响，早商文化因袭了夏文化的一些因素，但夏商文化不仅族属不同，文化性质也不相同。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即夏商文化各有贯串其文化始终的一组器物组合，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其器物组合的种类和数量有所损益，但其基本的组合不变，且用量化的统计方法显示其固有器物的数量是占较高比例的，并远高于新出现器物的数量。不仅如此，夏商文化在年代、分布

① 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郑光：《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和年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以及郑光先生的相关文章都有此一认识，如《夏商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田昌五先生也有类似认识，《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第380～388页；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② 孟凡人：《试谈夏文化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③ 《论语·为政》。

地域、文化特征、文化来源、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均存在差异^①。新的研究资料表明,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也有所不同,如夏代的农业生产始终表现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特点;而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小麦的种植规模突然大幅度提升^②。这应是夏商两个民族种植制度不同的反映。

虽然有关夏商文化关系的认识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学术界的分歧依然存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关于夏商文化分界即是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综合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五种不同的主张: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某段;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间^③。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公布及讨论的日趋深入,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现今主要是最后两种观点的对峙,即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某段或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间。

同时,由于先商文化的识别及论定^④,学术界也对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关系给予了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对夏末商族的南进路线、夏末商都亳地望的讨论、夏末先商文化的分布及新类型的确认、夏末商汤所伐夏之方国的地望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二、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现状

在岳石文化被确认后,围绕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方面涉及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渗透,主要是三种文化中的某一种文化都含有另两种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的分析,这一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包括二里头文化早期包含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与后羿代夏问题探讨^⑤;二里头文化晚期包含大量的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考察^⑥;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分析^⑦;郑州南关外

①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② 袁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形态研究》,《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27日第7版。

③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相关论文如高伟等先生撰写的《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等文章。

④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⑤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郑杰祥:《二里头早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⑥ 方辉:《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栾丰实:《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礼器中的东方因素》,《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⑦ 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83页;方辉:《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翠莲:《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考辨》,《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栾丰实:《论岳石文化的来源》,《纪年城子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先商文化包含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①；夏末商夷联盟的考古学研究^②；夏夷商三种文化交汇地带研究^③；早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及岳石文化的关系^④；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及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所反映的此一时期的商夷关系^⑤；商代后期商夷关系及商王朝对东夷的经略^⑥等。

当然，对于上述问题，有的已基本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有的问题尚存争议。如夏商文化的关系包括其分界问题；后羿代夏的考古学考察；郑州南关外期遗存的性质问题等。这些争议大部分是可以以现有的考古材料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进一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并且有的分歧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缩小，趋同性愈来愈强，但有的

-
- ①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83页；杜金鹏：《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方辉：《“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断限的启示》，《华夏文明》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旭：《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田昌五、方辉：《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张立东：《先商文化浅议》，《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② 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田昌五、方辉：《“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③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宋豫秦：《夏夷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刘春迎：《河南杞县境内夏夷商三族之考古》，《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郑清森：《豫东地区岳石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张翠莲：《试论豫东东部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 ④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陈旭：《郑州商文化渊源试析》，《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陈旭：《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 ⑤ 陈旭：《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与滕都问题》，《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第3版；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滕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任相宏：《郑州小双桥出土的岳石文化石器与仲丁征蓝夷》，《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滕（器）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徐基：《济南大辛庄商代文化遗存的再认识》，《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⑥ 高去寻：《殷礼的含贝握贝》，《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日〕近藤乔一：《商代海贝的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高广仁：《海岱区的商代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262页。

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考古材料,以新材料来验证各家观点的正确与否。

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探讨夏夷商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交流与融合,对峙与战争,并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揭示、分析,以及与此有关的早期国家阶段的文化融合、族与族之间的融合,早期国家的孕育与发展等诸问题的分析。

第四节 研究的意义与理论方法

夏商时期是我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文献记载有关夏商王朝的历史,虽多作肯定,但均语焉不详。而且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除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之外,商代前期上迄整个夏代,均没有发现对重建夏商历史有多少有价值的文字资料。从这一趋势看,这一奢望基本是不能实现的。虽然发现了早商时期的牛肋骨刻辞^①,但近50年的考古发掘并没有对早商的文字发现予以充实。夏代的文字尚没有确认,发掘者称其为刻划符号,并认为有的近似象形文字^②。从考古发掘的现状来看,与夏商有关的遗址和墓葬发现的规模和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夏代及商代前期文字资料的发现仍裹足不前。基于此,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纯粹等待考古工作者发现夏代及商代前期的文字来复原和研究夏商历史是不现实的。研究夏商历史只能以现有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记载来进行,而今后的考古资料是对现今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与检验。

一、研究意义

中国几千年文明绵延不绝,其文明如此具有生命力,与它的兼容并蓄,与邻近文化的相互竞争、影响、碰撞及融合,并最广泛地吸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是分不开的。这种交流传播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战争的、宗教的等诸方面。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动力、模式及道路等问题,必须涉及中国早期国家阶段夏商时期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部族及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学者都基本认同中国国家的形成基本上没有接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是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和国家^③。在文献资料匮乏、不能完全依靠文献资料来复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前提下,学术界不得不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寄希望于中国的考古学。

关于华夏族的形成,学术界基本可以勾画出它的发展轨迹。包括夏商周三代三族的融合,秦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与融合及宋代的民族迁徙与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8页;陈旭、徐昭峰:《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释文漏字原因探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巍:《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8~85页。